

ZHONGGUOREN

20

世纪

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

鲁迅／著

何凝（瞿秋白）／编

钱理群／导读

鲁迅杂感选集

u e e , o n b u o y z

贵州教育出版社

伍

鲁迅／著

何凝（瞿秋白）／编

钱理群／导读

鲁迅杂感选集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杂感选集/鲁迅著;瞿秋白编. —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1.8

ISBN 7 - 80650 - 193 - 2

I. 鲁… II. ①鲁…②瞿… III. 鲁迅杂文 - 选集
IV.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5318 号

鲁迅杂感选集

鲁 迅 著 何 凝(瞿秋白) 编 钱理群 导读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印 刷 贵阳圣泉彩印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1.125 印张 280 千字

印 数 1 - 3,230(册)

版次印次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650 - 193 - 2/I·17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三桥下五里 电话:4843555 邮编:550008

总 序

为刚刚逝去的“20 世纪”作总结,似乎是今日中国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崛起于艰难之际、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来说,20 世纪既灾难深重,又生机勃勃。时过境迁,不管是“灾难”还是“生机”,其蕴涵的酸甜苦辣,都将成为后人咀嚼回味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

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阅读者最好心存敬畏。不要说风和日丽,即使是斜阳余晖,也都值得论者认真鉴赏与品味。有感于此,本丛书不取大刀阔斧放言高论的姿态,而宁愿“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似乎有必要提醒笃信“进化”的国人,略为调整视线,俯下身来,流连身边的风景。对于有心人来说,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处,同样可以见精神。不妨借助一本本曾经激动过一个时代的书籍的重新阅读,触摸那很可能早就被历史的风沙抹平的精神印记,体会先辈们蹒跚的足迹。

相对于有形的政治、经济乃至学术、文化的成果,一代人的“精神遗传”显得不太张扬,故很难被心境浮躁的后来者所感知。重读“旧书”,我们不只可以了解曾经有过的知识、信仰、理想,乃至具体而微的心境;更可以通过其在历史上的“存在与遗失”,理解风光无限且变动不居的世界。

与一般意义上的遴选“经典”不同,本丛书关注的是几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故必然跨越具体的学科限制,且兼及著译与雅俗。

选书的标准,在于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力”,而不问是否“藏诸名山,传之后世”。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影响力可能迅速消失,也可能与日俱增,更可能时起时伏。描述如此奇妙的“书的命运”,并给予恰当而深入的解读,对于测量一个时代的思想深度与文化走向来说,也许是很好的入口处。

这里有政治家的宏愿、思想家的深思、学问家的博识、文学家的激情,以及普通人的常识与悲哀。不管是哪一类,希望均有值得述说的“接受的故事”。也就是说,书本身的魅力固然重要,可那留在历史上的“长长的影子”,同样令人怦然心动。

与书斋里的宏论不同,本丛书希望沟通专家常识与大众趣味,借“读书”回顾先辈的足迹,丰富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与历史意识,故关键在于“同情之理解”,而不是判断与裁定。具体的工作策略是:将书籍本身的评介与“接受史”的叙述融为一体,并掺入个人的阅读体验。假如撰写导读的专家们之“生花妙笔”能勾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使“旧书”介入“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功莫大焉。说到底,书,并非越新越好;人,也不一定越活越精神。这才有必要不时地回顾历史——包括阅读并未完全过时的好书。

理论上,只要是真正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著作,都有可能进入我们“重新阅读”的视野。可在具体操作中,却因某种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能不略有回避。另外,虽然丛书的选目已经大致确定,但考虑到各位专家的写作进度,出版时无法完全依照原作的年代排列。这两点,敬请读者原谅。

本丛书作为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持的项目,并不划地自牢,而是期待更多学界朋友与我们携手,借助“读书”,重新理解并阐释 20 世纪中国人并非贫瘠的精神生活。

丛书主编 陈平原

1999 年 12 月 14 日

目 录

导读:鲁迅远行以后	钱理群(1)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何 凝(99)
一九一八年:	
无题(《新青年》随感录之二十五)	(121)
无题(同上三十八)	(122)
无题(同上三十九)	(125)
“来了”(同上五十六)	(127)
现在的屠杀者(同上五十七)	(128)
有无相通(同上六十四)	(128)
一九二一年:	
知识即罪恶	(130)
事实胜于雄辩	(133)
一九二二年:	
所谓“国学”	(134)
	以上《热风》
一九二四年:	
论雷峰塔的倒掉	(136)
论照相之类	(138)
一九二五年: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44)

春末闲谈	(147)
灯下漫笔	(151)
杂忆	(157)
论“他妈的!”	(162)
论睁了眼看	(165)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68)
写在《坟》后面(一九二六)	(174)

以上《坟》

青年必读书	(179)
忽然想到之三,四	(180)
论辩的魂灵	(182)
夏三虫	(183)
忽然想到之五	(185)
北京通信	(186)
忽然想到之十一	(188)
并非闲话之二	(192)
十四年的“读经”	(195)
这个与那个	(198)
碎话	(203)

以上《华盖集》

一九二六年

学界的三魂	(206)
古书与白话	(208)
一点比喻	(210)
送灶日漫笔	(212)
谈皇帝	(214)

无花的蔷薇·····	(216)
无花的蔷薇之二·····	(220)
纪念刘和珍君·····	(223)
空谈·····	(227)
马上支日记·····	(230)
记谈话(培良)·····	(242)

以上《华盖集续编》

一九二七年：

略论中国人的脸·····	(247)
革命时代的文学·····	(250)
答有恒先生·····	(255)
谈“激烈”·····	(259)
扣丝杂感·····	(262)
“公理之所在”·····	(267)
新时代的放债法·····	(268)
小杂感·····	(270)
革命文学·····	(272)
卢梭和胃口·····	(274)
文学和出汗·····	(276)
文艺和革命·····	(277)
拟预言·····	(278)

以上《而已集》

怎么写(夜记之一)·····	(280)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286)

一九二八年：

文艺与革命·····	(293)
------------	-------

扁	(295)
路	(296)
太平歌诀	(297)
铲共大观	(298)

一九二九年：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300)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303)
流氓的变迁	(305)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306)

以上《三闲集》

一九三〇年：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30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10)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314)

一九三一年：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316)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317)
上海文艺之一瞥	(320)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330)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338)
“友邦惊诧”论	(340)

一九三二年：

二心集序言	(342)
-------------	-------

以上《二心集》

导读：鲁迅远行以后……

钱理群

他是在六十五年前的那一天那个阴冷的早晨——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告别这个世界，独自远行的。

没有人知道离别前有怎样的思绪缠绕着鲁迅。

他的日本友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在回忆10月17日“最后的会见”时，谈到鲁迅一见面就告诉他们，“这一次写了《女吊》”，神情颇为得意，“把面孔全部挤成皱纹而笑了”；接着就大谈“与死相关的事情：关于自杀，古今东西的幽魂，古老所谈的冥鬼等等”，“我还似乎听见鲁迅的笑声：‘在日本，就是被砍了头的人，变了幽魂，也是有头的罢。在中国却是没有头的’”……^①

他的“小朋友”萧红在回忆文章里告诉我们：在病中，“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不断地看着的”。那是一幅苏联画家的着色木刻，“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

^① 鹿地亘：《鲁迅和我》，池田幸子：《最后一天的鲁迅》，收《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2辑，52、53页，上海书店1979年据1937年初版复印。

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据说许广平“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①。

或许正因为“不知道”,无法明确地说出,却更能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

在他还能握笔时,也曾留下了这样的病危中的生命体验——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②

这段话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直到世纪末,人们还在引述,并借此而走近鲁迅。^③

在这一年里,他频频想到、谈及自己的创作——

1月8日,他在一封通信里,谈到美国《现代中国》月刊译载《阿Q正传》说:“我想永远是炒阿Q的冷饭,也颇无聊,不如选些未曾介绍过的作者的新作品,由那边译载。”^④

2月10日,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汇编三十年著述的计划:“回忆《坟》的第一篇,是1907年作,到今年足足30年了,除翻译不算外,写作共有200万字,颇想集成一部(约十本),印它几百部,以作纪念,且于欲得原版的人,也有便当之处。不过此事经费浩大,

①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收《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73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 鲁迅:《“这也是生活”……》,收《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6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林贤治:《鲁迅三论》,收《21世纪:鲁迅和我们》,30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作者说:“这是十分感人的。忘却一己的病弱之躯,依然怀想着‘无穷’和‘无数’,——正是狼的广大,一种犷悍中的温柔”。

④ 致沈雁冰,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108,2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大约不过空想而已。”^① 后来人们在鲁迅的遗稿中发现了著述目录二纸。其一将全部著作编为三辑，分别命名为“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②——这正是典型的“鲁迅世界”，他自己徘徊其间，抚摸“瘢痕”累累的旧文^③时，该是怎样一番心境？

4月2日，在与一个青年读者的通信中，他突然谈到：“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④

4月5日，他又向一位朋友发出感慨：“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⑤

5月8日，有老朋友来信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写信回答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以做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

① 致曹靖华，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210》，3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许广平：《〈鲁迅全集〉编校后记》，收《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辑，901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③ 参看鲁迅：《〈华盖集〉题记》：“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文收《鲁迅全集》第3卷《华盖集》，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致颜黎民，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402》，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⑤ 致王冶秋，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405》，3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而已。”^①

7月19日,因为有人建议将《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引发了鲁迅对他的作品的“本意”少有人“了解”的隐痛,以及因“隔膜”而产生的“无聊”感:“《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亦无聊,不如不作也。”^②——这时候距离鲁迅“告别”而去,只有三个月。

7月23日,鲁迅将《捷克文译本〈短篇小说选集〉序》手稿,一张照片及冯雪峰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一起寄给了捷克译本的译者普实克。据冯雪峰在1937年3月所写的《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一文的“附记”里所说,普实克曾要求鲁迅自己推荐一篇论他在文学上的地位的论文,作为译介时的参考;鲁迅首先想到的就是瞿秋白用“何凝”笔名发表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此书于1933年由青光书局出版,鲁迅亲自校对并联系出版,付出了极大心血);但考虑到文章太长,又是专论杂文,不完全符合普实克的要求,因而决定请冯雪峰另写一篇。冯文仍然延续了瞿

① 致李霁野,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508》,3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致沈西苓,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719》,3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此信引发了关于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本意”的大半个世纪的讨论。直到2000年笔者还收到一位年近七十的鲁迅业余研究者的来信,是他提醒我注意到鲁迅逝世前仍萦怀于心的这一隐忧。我在回信中,也建议他注意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的这段话:“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之后”。(见《鲁迅全集》3卷《华盖集续编》,379页)。在我看来,鲁迅这里讲的正是他的“意思”:他关注的是,“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的中国的“改革”与“阿Q”及“阿Q似的革命党”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改革”的性质与命运;我想,到了世纪末经历了、并正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改革”,我们对鲁迅的“意思”当会有更深切的感受。

秋白的思路，强调了鲁迅的“杂感散文在思想意义之外又是很高的而且独创的艺术作品”，正是这一点，得到了鲁迅的充分肯定，并引出了一番慨叹：“作这种评价的还只有何凝一个人！同时，看出我攻击章士钊和陈源一类人，是将他们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典型一点来的，也还只有何凝一个人！我实在不佩服一些所谓的前进的批评家，他们是眼睛不看社会的，以为总是鲁迅爱骂人，我在战场上和人斗，他们就在背后冷笑……”^① 鲁迅的慨叹里充满浓重的隔膜感与孤独感：如瞿秋白所说，人们（不仅是“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也还有那些“所谓的前进的批评家”）根本不能理解鲁迅这样的“革命作家”（“精神界的战士”）：他们总是公开地表示“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因而创造了以“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为特色的“杂感”这样的全新的“文体”；在鲁迅自己，显然是更为看重他在这方面的创造业绩的，却总是被忽视，被贬抑，以至“爱骂人”的恶名，不但生前“罩”着鲁迅，而且一直追逐到大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② 明乎此，就不难懂得当年鲁迅得到瞿秋白的评价，为什么会有如遇

① 冯雪峰：《关于鲁迅在文学上的地位——1936年7月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及《附记》，收《雪峰文集》4卷，22～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笔者看来，冯雪峰的《附记》写于1937年3月，是在鲁迅逝世不久，这时候关于鲁迅与瞿秋白关系的回忆是更为可靠的。

② 在90年代甚至有过“鲁迅骂人文选”的出版热，先后出版了《一个都不饶恕》（中国文联公司，1996）、《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中国出版社，1996），还出版了有关研究专著，如《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其背景就是社会上与思想文化界再度出现了关于“鲁迅爱骂人”的“批评热”。一位学者在《恩怨录》序言里，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对于鲁迅的不肯费厄泼赖，对于鲁迅的刻薄多疑，对于鲁迅的不合常情，这十年来谈得真是不少了”。

“知己”之感。^①至于瞿秋白序言里的其他论断,如以“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概括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强调鲁迅“和农民群众有比较巩固的联系”,“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将鲁迅精神总结为“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等等,都对以后的人们对鲁迅的认识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不断受到质疑、诘难,本身就构成了鲁迅接受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本文的叙述中,也将不断提及。——不过,这都是“后话”。

到了8月12日,鲁迅即因肺支气管破裂而吐血,体重也下降到38.7公斤。接着就有自称为“战友”的徐懋庸“雄纠纠首先打上门来”,“横暴到忘其所以,竟用‘实际解决’来恐吓”,大病中的鲁迅以为事关“中国文艺的前途”勉作回击,^②心力耗尽,不再谈及自己的创作,却于9月5日所写的《死》一文中,拟定七条“遗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惟一的儿子的关照——

“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③

这临终叮咛是惊心动魄的:既包含了对“空头”文学家、美术家的轻蔑,恐怕还蕴含着更为深刻的绝望。这背后有一部“历史”:世纪初,怀着“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

① 鲁迅曾录清人何溱(瓦琴)的集句书赠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见杨之华:《忆秋白·九》,文收《忆秋白》,2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致王冶秋,收《鲁迅全集》13卷《书信·360915》,4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此文公开发表时,改成“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在以后的选集、全集里也都有“空头”这一限制词。据冯雪峰回忆,这是鲁迅听取了他的意见后在原稿上加上去的。参看冯雪峰:《回忆鲁迅》,文收《雪峰文集》4卷,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神的……当然要推文艺”^① 的启蒙主义理想，而走上文学之路；随后无人响应的“寂寞”，“使我反省”，看清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时，既看到“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却又怀疑于自己的怀疑，“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而提起笔来，阴差阳错成了文学家^③；以后经历了“三一八惨案”、“四一五大屠杀”的“血的游戏”，终于“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而自己既“无效力”且又“无聊”的文字不过是“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进而为“我自己也帮助着排（吃人的）筵席”而痛心疾首，却仍不放弃“挣扎”，“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眷在纸上”^④；此后又是十年，目睹了更多的血的屠戮和“暗暗的死”，经历了更大的无聊：一切努力，一切挣扎，不是被利用，就是变成哈哈一笑，连自己文章的“本意”也无人理解，到处充斥的却是“无文的人文”、“商定的文豪”、“禁人作文的文学家”，于是逼出了这最后的觉悟：“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这里，前后贯穿三十余年的，是对启蒙主义的两难选择：坚守中的质疑与质疑中的坚守，充分展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的“精神界战士”的矛盾与困境，至死没有、也无法摆脱。

① 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1卷《呐喊》，4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1卷《呐喊》，417～41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鲁迅：《呐喊·自序》，收《鲁迅全集》1卷《呐喊》，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鲁迅：《答有恒先生》，收《鲁迅全集》3卷《而已集》，457页，454页，457～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尽管绝望,但鲁迅仍要坚守住最后一条线。于是,就有了不断被非议的这两段话——

“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①

鲁迅早就说过,他与“怨敌”之间,并无私怨,“实为公仇”。^②或如 90 年代一位研究者所说,在与怨敌的论战中,“他从中看到的不仅是他所面对的人,而且是他所面对、也是他所背负的历史——那个著名的黑暗的闸门”,那不断产生的奴役与压迫关系,以及“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③所谓对怨敌“一个都不宽恕”,对鲁迅来说,不仅是要坚持论战中的是非,更是要坚守他所说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立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④

“遗嘱”中的下面两条也同样发人深省——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糊涂虫。”

同样的意思,十一年前那场大病中就已经表达过:在“为爱我

① 鲁迅:《死》,收《鲁迅全集》6 卷《且介亭杂文末编》,61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② 鲁迅致杨霁云:“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鲁迅全集》12 卷《书信·340522》,423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③ 汪晖:《序四》,《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16 页,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④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8 卷《集外集拾遗补编》,190~19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一文中,还提出过“永远的革命者”的概念,《鲁迅全集》7 卷《集外集拾遗》294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